

無影響，即無意義。毛澤東最後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他顯然不是一個狹隘的湖南民族主義者。作者刻意描述湖南是像瑞士一樣的獨立國家之餘，結果所產生的湖南憲法卻是省憲而非國憲，聯省自治亦非分裂運動，似與作者所設想的邏輯不合。作者力言，「大清帝國不是民國，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頁 220），但歷史發展的結果，今日之中國，除了外蒙之外，基本上承繼了大清帝國的疆域，而且像美國一樣，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湖南只是一個省而已。

作者寫作動機原是覺得在現代中國的論述中，湖南人被忽略了，其實不然。王夫之、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譚延闓、毛澤東等歷史名人，讀史者都知道他們是湖南人。然而作者非要把這些人從中國歷史中區隔出來，將王夫之視為湖南民族主義的祖師爺，將湖南民族主義建築在王夫之、郭嵩燾、譚嗣同之上，甚至於認為湖南人不是中國人，豈是稍讀中國史者所能認可？

內容之外，不得不指出此書若干編輯上的缺失：內容時有重複之處，沒有引用書目可稽，腳注並不周全，漢語拼音全無漢字對照，使有些名不見經傳的姓名無法查考。作者又誤以為上海公共租界在蘇報案中無前例地干預司法，似不知租界內有審判權。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亦未能免於此等缺失，尤令人遺憾。

汪榮祖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By Wen-hsin Ye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xiii + 305. \$55.00 cloth, \$24.95 paper.

葉文心的新著《上海輝煌：經濟情感與近代中國的形成，1843–1949》，是自從李歐梵的《上海摩登》¹以來，又一本關於上海近現代史的力作，不僅與近年來面世的高家龍著作《發明南京路》和《中國藥人》²及 Frank Dikötter 的《異域風情之商品》³相映成

¹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 Sherman Cochran, ed.,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00); idem,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³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趣，且有異曲同工之妙。葉教授是許多讀者所熟悉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她對原始資料的掌握和對上海史研究之學術成果的熟稔，從本書的參考文獻中可見一斑。儘管本書包括了她本人以前發表過的若干研究成果（第四、五、六章的內容），但全書其實建立在一個更為深廣的歷史視野之中，從一個新穎的角度剖析了鴉片戰爭之後一個世紀內上海的社會變遷。

本書開篇即明確揭示其主要命題如下：「在鴉片戰爭（1839—42）之後一個世紀內，以根深蒂固的對商人的愛恨交加情緒為背景，一個中產階級在上海出現並獲得了社會合法性。以它會給全民族帶來物質利益為理由，這個中產階級投身於追求工業財富。它成功地把關於財富的話語以科學的範疇來表述，同時與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中國政府結成同盟。在二十世紀前半期，這種新的財富被說成是愛國的、科學的、民主的。儘管新財富的大部份存在於外國租界內並為具有官僚關係的商業精英網絡所掌握，私有的資本主義企業被說成是對中華民族的富強作出了貢獻。」（頁1）環繞這一主題，本書以七章的篇幅（及一個簡短的跋）加以闡發。

在第一章〈轉向物質〉（The Material Turn）裏，作者借用了李·格林費爾德（Leah Greenfeld）「經濟主義」（economism）的概念，而不是人們常用的「資本主義」概念，來強調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對經濟發展給予在物質上和觀念上前所未有的注重。「經濟主義」是指以對經濟問題的關注為中心的一種思想狀態和生活態度，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因經濟主義興起而產生的一個關鍵的社會變化，即與傳統思想的一個重要分野，就是人們開始在道德和倫理上賦予商業活動和追求物質財富以合法性。作者認為嚴復對亞當·史密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譯述」（不是忠於原文的「翻譯」）是這一思想態度轉變的標誌之一。

作者指出，近來的學術研究已經證明，其實從十五世紀開始，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一直在不斷上升之中；隨著商人子弟以科舉入仕升官，「士」和「商」之間的劃分日益被打破。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十九世紀下半葉，一個新的商人群體即買辦商人出現了。他們的生存狀態代表著一種中式的和西式的趣味、傳統的和現代的文化相結合的雜交文化，而他們所聚集的物質財富則引人注目，但並不令人側目。在使商業活動和商人階級取得社會尊重的公共話語中，「商戰」的概念的引入起了很大的作用。把民族之間的競爭歸結為以工業為基礎的商業競爭的觀念，極大地提高了商人作為愛國者的合法性，並導致政府官員和國家對商業和商人的重新估價；洋務運動中的「保商」的概念，「官督商辦」原則的提出和實踐，乃至「商學」作為一種專門學問，「商會」作為一種合法社會組織的出現，以及「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等促進商業的法律條文的頒布等等，皆源於此。

第二章〈商業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Commerce）討論國家和商業的關係。作者敘述了「商學」概念的出現、商學院的建立、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歷史、《商業實用辭典》的編撰發行和會計師行業的興起。讀者會意識到，這些現象的發生並非都是由於政府作為，但是它們顯然為政府開始規範商業和自由職業如會計業準備了條件（包括

為政府提供了這方面的管理人員)。

第三章〈視覺政治與上海魅力〉(Visual Politics and Shanghai Glamour) 探討一個現代上海的形象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首先，上海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迅速崛起為物質財富最為集中的中國城市，成為中外雜處、萬物交匯之勝地。作者引用葛元煦發表於 1876 的《滬游雜記》，歷數充斥上海市場的各種中外產品，從水果、乾果、花木、魚鳥、參藥、印章、佛珠，到鐘表、玻璃球、巧克力、人體解剖圖、針灸穴位圖。歐洲人給中國引進的舶來品——如西式時裝、印刷品、油畫、照相機、顯微鏡、印刷機、解剖刀、電燈泡、洗滌劑、留聲機、電影院——成為上海社會生態的一部份，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存在則改變了上海的空間和地貌，帶來了鐘樓、教堂、公園、馬路、街燈、電車、球形屋頂、拱形天花板、臺階式大門、廊柱式房屋正面和鋼筋水泥結構。從功能上來說，各色建築包括了商行、銀行、碼頭、倉庫、俱樂部、旅館、酒吧、消防站、教堂、警察署、法庭、領事館和工部局。

其次，上述這一切物質的變化通過照片、圖畫、月份牌、廣告牌、電影等視覺媒介以及廣播電臺這一聽覺媒介得到了充分的形象表現而為人們所熟悉，而這些與一個「形象工業」(image industry) 的興起密切相關。作者根據近年來上海史研究的成果和她本人的研究，介紹了新聞業(如《申報》、《新聞報》和《滬報》)、廣告業(特別是紡織品、化妝品和香烟的廣告)、百貨公司(如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廣播電臺和國貨運動在展示現代上海的形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可能有些讀者對上述故事或多或少有所熟悉，但是作者並沒有停留在重複這些故事的層面上。作者成功地把這些視覺表現的歷史事實聯繫到本書的主題，即財富(商業)和對財富的追求(企業家)是如何取得社會合法性的。比如，作者指出，國貨展覽會和世界博覽會中的中國產品，這些「置於安排好的氛圍中的商品，成為視覺感知的適當對象，但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代表文明要素——如『中國的』、『現代的』等等——的對象。這樣，技術、商業的組織力量和國家聯合起來，給作為愛國公民的消費者展現了機器和物質的奇觀」(頁 76)。

第四章〈時鐘與大院〉(The Clock and the Compound) 通過檢視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內部運作來揭示一個現代社會的重要因素：時間觀念和組織紀律；而中國人對這一現代社會之要求的接受和適應則反映了上海社會變遷和經濟主義在中國興起的一個側面。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職工的生活被嚴密地組織化，他們在職工宿舍集體住宿，在職工食堂集體用餐，在訓練班接受專業培訓，從而培養敬業和互助的精神，嚴格遵守工作時間和銀行紀律，形成一個有效率的工作團隊；而銀行經理則以大家長的風範進行管理。作者指出，所有這些都是後來社會主義「工作單位」的先聲。

作者認為，在外國產品被本土化和提倡機器科學的過程中，一個把新的商業文化或金錢文化包裝成現代性和愛國主義的文化運動也相應展開。第五章〈開明的家長主義〉(Enlightened Paternalism) 即以中華職業教育社出版、鄒韜奮編輯的《生活周刊》作為個案來說明這一現象。以職業青年為對象，《生活周刊》宣傳和反映了以經濟主

義為基礎的新的生活觀：個人奮鬥，吃苦耐勞，道德修養，以成功立業。同時，該刊也討論了家庭和婚姻問題：它推崇小家庭，並強調穩定的家庭所需的必要物質基礎。到三十年代初期，《生活周刊》日益左傾，經常批評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政策，最終於 1933 年 6 月被封閉。兩年後鄒韜奮又發起的《大眾生活》周刊，則已經離開了《生活周刊》原來的主旨，成為當時左翼文化的一部份。

第六章〈小市民與悲慘故事〉(Petty Urbanites and Tales of Woe) 繼續關注上海的出版物，特別是出版於 1935–1937 年的《讀書生活》雜誌，這與《生活周刊》所宣傳和反映的思想形成對照。該刊物討論個人的不幸遭遇而追溯其社會根源。作者指出，三十年代以《讀書生活》為代表的左翼話語在把注意力從個人轉到家庭時，它以物質生存和家庭義務這樣的議題取代了五四時代風靡一時的個人權利和個人幸福的議題，並構建了以家庭為背景的「男」和「女」的社會角色。更進一步，左翼話語把個人置於物質和倫理的關係網絡中，因而從討論個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延伸到對社會制度加以批評，結果就是否定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機制以及理想化的小家庭幸福的實際可能性。

第七章〈從大家長到資本家〉(From Patriarchs to Capitalists) 敘述 1937–1949 年的上海。本章的大部份描寫了永安公司在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如何繼續生存和發展的故事；一部份描寫了汪偽政權與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爭鬥對上海銀行界的影響；另一條綫則是百貨公司和銀行界職工如何在抗戰期間及以後逐漸取得了對企業家和銀行家及經理階層的話語權。在關於社會公正的話語中，企業家喪失了他們的道德權威，因為他們對職工難以度日的艱辛生活毫無作為。也就是說，他們不再是關心照顧職工的大家長，而是惟利是圖的資本家。同時，有些職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所有這一切，都為 1949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接管上海做了準備。用作者的話說，「到四十年代末期，上海小市民在中國共產黨裏找到了位置和效忠對象。取得了勝利的〔共產〕黨許諾，它將堅持社會公正的原則和按照各人的貢獻來分配制度化的福利。幾十年來由大家長制定上海資本主義規則的日子由此結束了」(頁 204)。

跋〈銀行家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Banker) 概要地介紹了在後毛時代改革開放和上海重新成為著名國際都市之一的背景下，上海人如何重塑充滿懷舊情緒的、展現一個輝煌過去的歷史形象，其中企業家和銀行家佔有重要位置。作者指出，鴉片戰爭後一個世紀中的上海具有何種歷史意義取決於一定的話語框架，而這種框架又處於整個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歷史的構建中。

對一部著作吹毛求疵似乎是學術界撰寫書評的慣例，筆者亦未能免俗，在此提出一二管見，希望有助於讀者更好地把握本書。第一，本書的結構是以一個主要命題為框架，再將不同的研究課題歸攏為一體。在此過程中，個別章節(如關於《大眾生活》和《讀書生活》的部份)與主題的契合還不盡貼切。第二，本書第二章關於國家作用的討論也略顯單薄。筆者理解，因為葉教授將本書建立在一個以社會變遷為對象的研究框架中，所以國家在此過程中的作用不是它的重點。關於國家之作用這一

議題（包括上海會計師行業與國家的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拙著《民國時期的國家與社會：自由職業團體在上海的興起，1912–1937》。⁴

上述意見見仁見智，但無礙筆者對全書之欣賞和推薦——本書無疑應當列為學習上海史的必讀書。我們可以期待，對上海近現代歷史的重新認識和理解將不斷深化。葉文心的這本著作對上海和中國近現代史的進一步研究，特別是對歷史上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交合點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個新的啓發和幫助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徐小群

美國 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 歷史系

Pattern and Person: Ornament, Society, and Self in Classical China. By Martin J. Power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xvi + 374. \$49.95/£32.95.

When I was asked to review Professor Powers's book, I was a little concerned because of my fairly weak understanding of the questions related to "Classical China." Someone who specialize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is often ill-equipped to understand the very different set of issues concerning that remote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My worries were however put to rest very quickly as I started reading the book: Martin Powers makes sure at every step that the unfamiliar readers are given more than enough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and make their way through the concepts explored by this enlightening book. My near-ignoranc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period, and the brilliance of the book, pushed me to write as detailed as possible an account of its content, as a result this book review might seem longer than usual for that sort of exercise. Similarly, not wanting to miss any of the ideas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I took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approach and simply reviewed each chapter in turn.

In this book, Professor Powers tackled an extremely ambitious project, namely "to write an extended meditation on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art: how artefacts encode basic propositions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person" (p. i). Rather than embarking on

⁴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也可參考其英文版前身，*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但英文版不包括關於會計師的那一章。